



张卫东◎著

文化的符号与结构

——罗兰·巴爾特的文本理论研究

SIGN AND STRUCTURE IN CULTURE
—A STUDY ON ROLAND BARTHES' TEXT THE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研究受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著作出版基金（编号为 NR2016054）的资助。

张卫东◎著

文化的符号与结构

——罗兰·巴爾特的文本理论研究

SIGN AND STRUCTURE IN CULTURE
—A STUDY ON ROLAND BARTHES' TEXT THE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的符号与结构: 罗兰·巴爾特的文本理论研究 /
张卫东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10
ISBN 978-7-5192-1901-7

I . ①文… II . ①张… III . ①巴特 (Barthes, Roland
1915-1980) — 符号学 — 研究 IV . ① B565.59 ②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5816 号

文化的符号与结构 —— 罗兰·巴爾特的文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宋 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74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1901-7/I · 041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 言

《周易·贲卦》曾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也曾说过，“文化是人类灵魂的耕耘”。文化“使人类摆脱野蛮，通过巧法成为完全的人”（塞缪尔·普芬道夫）。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社会所有活动特征的总和”。文化以象征为基础、以符号系统为核心、以文本为载体，是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体表征。文化具有系统性、社会性、时代性、地域性。文化由符号构成，有其独特的结构。而文学是文化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的欧洲，古典学科传统尤其是实证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为了反对学院主义的学术霸权和传统文化的专断，法国结构主义在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双重影响下悄然登场，作为“结构主义之母”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后简称为“巴尔特”）（1915—1980）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受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等人的影响，他试图建立一门研究符号意指的科学来描述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在重新阐释语言、符号、文本三者关系之后，巴尔特从大众文化研究入手，发现了隐存在语言当中的布尔乔亚阶级意识的神话结构，并描述了此系统结构的意指模式。为了阐述文本意义的生成，他建立了一套叙事句法，为文本描述了一个横组合关系的结构模式。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遭到了学院派的激烈批评。但巴尔特并没有停滞不前，在总结和自省的基础上，他接受了克里斯蒂娃（J. Kristeva）介绍的巴赫金复调

理论，提出“复数性”文本、“互文性”和“迷醉写作”等概念，这标志着他迈向后结构主义的道场，因此他也被讥讽为“结构主义的变色龙”。然而，正是由于巴爾特的理性、前进、否定、解构，使得他不仅在结构主义“活动”中独执牛耳，也让他了解构主义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对理性科学的追求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风格为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其自我解构的精神也值得后人敬仰。

本书以文本符号理论为研究核心，运用分析综合法与演绎法，致力于探索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巴爾特文本理论的内核和指导意义，并进一步探究其理论缺陷和解决办法，为文化批评提供更广阔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基础。重点探讨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 (1) 文化批评视域下的语言、符号、文本的辩证关系。
- (2) 文化中的神话文本及其破译与读解。
- (3) 文化中的叙事及其结构。
- (4) 文化文本的阐释空间和特性。
- (5) 文化批评中的“科学性”问题及文本的分类问题。

绪论之后本书分为五章。通过历时比较法，梳理巴爾特的文化文本理论。第一章主要重新界定和阐释了文化批评中的文本的概念，论证了：文本的核心要素为符号；符号按照规则组合成文本；符号携带文化信息，具有文化性。关于符号、文本及两者之间辩证关系，巴爾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体现：首先，他阐明了符号的语言学属性，并尝试建立一种研究符号意指系统的科学——它高于狭义语言学但从属于广义语言学；其次，他在索绪尔语言学系统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符号学系统，提出符号的四组关系：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段与系统以及直指与涵指。符号学是语言学的解体；再次，文本是由语言通过横组合与纵聚合组成的符号系统。而语言是文本的载体，文本描述文学意义的生成。逆向推论得出，文学（文化）研究必须以文本本身为研究对象，从而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即符号系统。这就为建构结构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主要论述文化中的神话及其读解与破译。神话是一种隐含意识形态的

言说方式，是布尔乔亚阶级“权势话语”的隐性表征。在发现此神话结构之后，巴尔特建立了一个文化意指模式，用来描述意义及意义的生成机制。在此，巴尔特区分了语言系统和神话系统，神话系统是语言系统的次符号学系统，或曰元语言系统。在这个神话系统的结构中，语言层面的能指是意义（sense），神话层面上的能指是形式（form），而意指是两者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神话系统结构。文化中的神话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本，其本质是一种由语言与言语组成的整体语言，它可归纳为传递某种意指的复杂的嵌套语言系统。通过运用巴尔特的文本解读法发现，神话的自然化与反政治化的特性决定了神话传递的意指具有隐蔽性，它能更有效地使得此意指被接受和传播，因此错误意指通过神话传递也更具破坏性。而作为文化中的神话或神话集合，文学作品的创作则需掌握自然化地传递意指的神话构造术。

第三章主要论述文化中的叙事及文本的句法。在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建构了一套叙事句法，用来分析叙事文本。他将此句法归纳为三个生成要素：意义、功能、行动。而叙事系统则是切分和整合的互动过程，并进一步归约了行动序列的几种关系。

第四章主要论述文化中的后结构主义文本阐释。巴尔特后期结构主义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为：阅读符码和文本间性。通过分析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巴尔特提出了“可写文本”与“可读文本”的区分，并总结出控制文本的五种符码：阐释符码、布局符码、意素符码、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每种符码都是一种声音，“编织”出整个文本网络。而文本与文本之间，则按照一种引述的方式相互联结。因此，文本分析不是寻找一种终极意义，而是寻求一切可能的意义。最终目的在于能“设想、想象、激活文本的多元性，其意义过程的开放性”。本章论述了文化文本阐释的方法和文本的特性，即互涉性、多义性、开放性、生成性。并根据巴尔特的叙事语法，分析了莫言的短篇小说《放鸭》，描述了《放鸭》的叙事结构。

第五章为方法论的总结篇。从俄罗斯形式主义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都曾试图建立一种准科学式的文本分析方法，以摆脱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主观性。他们的做法是运用语言学理论将文学文本视作一种语言，找出生成文本的最小单位和组织结

构规则。然而，形式化其结构不等于真正的科学性，其结果如同 20 世纪物理主义统一科学的失败一样，最终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之中。文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其结构形式，而在于多元意义的张力场上。在考察了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之后，本书试图探究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局限，论证文学中所谓“科学主义追求”的偏狭，分析当代文论的需求转向，提出“新文化批评”的设想。在借用传统结构主义区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文本类型学，并构建一种新的批评模式。

本书因此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科学性”、“文学性”探求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为文化文本研究提供了一种较精密的分析框架，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第二，和其他结构主义方法一样，巴尔特的文本分析陷入了将文本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并做出若干二元区分，形成了一个逻各斯中心，割裂了文化文本的社会性；第三，巴尔特作为一个追求意义多元、寻求文本开放的文论家，他没有裹足于前期僵死的生成句法，而是适时地迈入解构主义的阵营，其勇于解构自己、否定自己、不断求索的历史主义发展观值得后人学习；第四，后现代文化批评的最显著特性是意义多元、文本开放。新时期文论界应该努力构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使文化研究的“内部”与“外部”有机整合，促进理论向前发展。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根基和方法论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由本人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修改而成，它既是本人在博士阶段研究项目的自然延伸，也是本人未来学术方向的一个前期准备。本人在 2006—2013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出于对符号学的兴趣，博士阶段专攻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导师组建议本人研究发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最终在导师康澄教授和张杰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出博士论文《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研究》。2013 年 11 月进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在进站之初，本人在征得导师朱刚教授的同意后，将自己的在站研究项目定名为：《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与当代大众文化》。在撰写博士后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我留意到巴尔特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虽然以数理逻辑式的准科学分析方法著称，

但这些符号都以文本为表征形式，而文本内部的结构和外部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把内部的结构看作是一种系统，那么外部的内容则可以表现为文化。这恰恰验证了为什么巴尔特到了晚年回到他研究的起点——文化。饮食、服装、时尚、建筑都是一种文化。可以说巴尔特从文化入手，以文化结束。

自2013年7月起，我供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俄罗斯文艺》、《学术界》等期刊上发表文章，主持多个获批项目：2013年获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才引进基金的资助；2014年获得江苏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2014JD06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基金（人文社科类）（编号为：56XAB14017）的立项资助；2015年以此为理论基础的项目获得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为：15WWC004）的立项资助；2016年更喜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为16CWW005）的立项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编号为NR2016054）的资助，受资助的经费共计33万余元，并最终让本书得以出版。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在博士阶段的导师康澄教授，是她引领我走进符号学领域，教会我做学问的思维方法，包容我的错误，鼓励我的进步。从论文的选题、结构、框架到分析方法的形成她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的行文风格，甚至遣词造句都有她的影子。如果我的这次历险算得上薄有所成的话，那么这全应归功于她。没有她，便没有我的符号学研究。

感谢我博士后阶段的恩师朱刚教授对我的倾力教导和精心栽培，他的睿智和风度，他的学识和师德都让我万分敬仰，他每一次的指导都让我如沐春风。没有他，我是不可能完成博士后阶段的学术任务的。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第一次听他讲课就为他的学识、幽默、睿智、风度所折服。他不断启发我们要具有批判思维，具有问题意识，是他让我的写作拥有了灵魂。特别感谢他一直以来给我的关心和教导。也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我论文的写作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学习氛围。感谢我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王娟教授；感谢钱满素教授、吕俊教授、傅

俊教授、黄和斌教授、辛斌教授、姚君伟教授、倪传斌教授、刘宇红教授、马广惠教授、王冬竹教授、汪少华教授、陈莉萍教授、王晓英教授等开设了非常有益的课程；感谢王永祥教授对我的帮助，感谢他的严谨、他的宽容。我还要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金才教授、何宁教授、陈新仁教授、何成洲教授等，他们在博士后论坛上给予了我中肯的评价和宝贵的建议。同时也感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专家——许钧教授、张新木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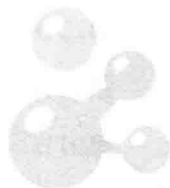
感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范祥涛教授、何江胜教授、刘长江教授、徐以中教授等为本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术支持，感谢我的同窗好友王海林为本书提供极为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巴尔特的理论向来晦涩难懂，加上“理论冷却”的时代背景，使得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难度和挫折，展现在眼前的这本浅陋的小册子虽然饱含了本人的汗水与泪水，但仍然只能算得上是一次“历险”、一次尝试。由于本人学养有限，外加时间紧张，导致本书在行文架构上可能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措辞也较为粗糙，对此我深感歉疚，同时衷心期望各位同仁们提出宝贵建议。

张卫东

2016年7月3日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文化研究视域下的文本	027
第一节 文本的重新界定	028
第二节 文本的核心要素：符号	037
第三节 文化中的符号与符号的文化性	051
第二章 文化中的神话及其读解与破译	061
第一节 文化中的“神话”：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	062
第二节 “神话”文本系统的结构	064
第三节 对当代中国一则神话的批判	069
第四节 文学的神话：自然化地传递意指	076
第三章 文化中的叙事及其结构	080
第一节 叙事文本的“语言（langue）”	081
第二节 功 能 层	084
第三节 行动层及行动序列	088
第四节 叙事及叙事系统	090

第四章 文化中的后结构主义文本阐释.....096

 第一节 后结构主义：结构的一种变形097

 第二节 阅读符码与文本阐释101

 第三节 文化文本的功能符码：以莫言小说《放鸭》为例108

 第四节 文化文本的特性：互涉性、多义性、生成性和开放性116

 第五节 与巴赫金“对话”124

第五章 方法论的反思.....134

 第一节 文学的科学性问题135

 第二节 新文化批评：一种新方法的历险146

结 语.....153

参考文献.....156

附录 罗兰·巴尔特生平.....167

后 记.....170

绪 论

一、研究对象：罗兰·巴尔特及其结构主义符号学概述

“结构”一词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起初的意义是“建造大楼的方式”^①。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最早可追溯到1922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导论》中谈及的“状态结构论”。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首次将此词用来描述语言的存在和运动状态。英国文学理论家特伦斯·霍克斯把结构主义定义为“有关于理解主观世界与物质世界结合构造的一种思考方式”^②。20世纪中叶，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语言学派发轫而来的一场“活动”在法国悄然兴起，并迅速登上欧洲人文思想主坛。结构主义借助语言学理论，宣布要为人文学科研究找到一种科学性（scientificity）。在许多具有政治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看来，结构主义的方法是去意识形态化（desideologisation）的强有力的工具。而作为法国结构主义“四个火枪手”^③之一的巴尔特自然也活跃在这个舞台上，并且开创了符号学视角的

① [法]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导论第4页。

② Hawkes, T.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6.

③ 实际上为五人，学界称他们为20世纪法国思想家五杰：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雅克·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

文本分析方法，成为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被誉为“结构主义之母”^①。

在巴尔特看来，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种运动，因为它没有什么自成体系的学说或论争”^②。他把结构主义看作是一场“活动（activity）”，其目的在于“重构一种‘对象’，并在重构的过程中发现各功能项的运作规律”^③。巴尔特不愿意把结构主义看作一种学术思想，因为这是先验地固守一种判断的表现。而建立在结构主义基础上的符号学却是适切的，符号学的理论来源就是语言学。对此，巴尔特曾对结构主义作出了这样一个定位：

我认为，结构主义这个术语今天应该留给特别强调与语言学有直接联系的那种方法论的运动……在我看来，这是最确切的标准。^④

巴尔特进一步强调，言语活动的生成是一种符号化活动。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建立在功能的类比之上[列维-斯特劳（Levi-Strauss）称之为同构关系]。简言之，结构主义是一种模仿活动，是一种描述单位与潜在单位区分关系的技巧。很明显，这就是语言学“聚合体”的概念。在谈到结构主义操作过程时，他说：“要弄清楚结构主义所持的基本观点必须先了解‘聚合体’这一基本概念。”^⑤而文学作品是各功能单位以及按照规律性聚合形成的单位集合，也是意义的连续体。所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最终是寻找产生意义的机制。

巴尔特是以反对萨特“介入文学”，提倡“零度写作”登上学术舞台的。二战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日趋激烈。以萨特为首的“道德主义”批评家们倡

① 与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对应。

② Barthes, R. *Crit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3.

③ Barthes, R. *Crit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4.

④ 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97.

⑤ Barthes, R. *Crit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5.

导文学介入政治，介入生活，承担起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在萨特看来，文学就是争取自由的武器。“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① 我们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首先是强调“人的存在”。在他看来，“我”的存在是追求自由的核心，人并非生来是“我”，“我”之所以是我完全是因为“我”的选择。因此，萨特强调的是文学的“我”，选择自由的理论以及文学作为选择有效武器的理论，这些和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历史哲学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为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巴尔特在某些方面是和萨特站在一起的。^② 但他反对文学“介入”。他号召一种“零度写作（writing degree zero）”，即无意识写作。应该说，这是巴尔特宣示其写作观的切入点。与萨特的介入相反，巴尔特号召写作应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这可以算得上是他结构主义思想的萌芽。巴尔特认为，“现代文学作品不适合再用古典文学分析的方法。从福楼拜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已经证明，文学已经变成了语言问题，文学开始关注的是语言自身而不再是社会生活。所谓古典文学分析方法，统称为政治写作，分为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看来，写作或曰文学本质上是语言学问题，写作是一个单纯的‘不及物’活动，写作不指向自然、社会、人生，不再是任何思想、价值的工具，是一个符号系统，写作活动本身成为文学的核心”^③。巴尔特倡导一种“绝对写作”即“白色写作（white write）”，也就是说，写作的绝对主体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性的、白色的、零度的写作，即回避或摆脱社会性价值判断和实践介入，以维持一种文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一致性。”^④

既然“一切问题皆语言”，那么巴尔特必然要寻求语言学理论的支撑。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在教程里，

① [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文集》第七卷，沈志明、艾珉主编，施康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② 巴尔特曾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强调他接受存在主义的那一套。

③ 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④ 李幼蒸：《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7页。

索绪尔对语言进行了若干二元区分，包括语言与言语、历史与共时、组合与聚合等。这为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大约从1955年开始，巴尔特开始阅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同时吸收了布拉格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文学性（literacy）”理论和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glossemantics），初步建立了符号学理论基础，其标志是1957年《神话集》和1963年《符号学原理》的出版。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符号学建构期”。也是他结构主义思想最为明显的时期。此后，巴尔特也为他选择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做过解释。在他看来，和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样，语言，包括其他结构在认识论上的“语言契约”具有不可争辩的同构性。在1973年发表的《索绪尔、符号、民主》一文中他写道：

语言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必须假定一个规则系统（与其相互依存的必要性）：（类比的和价值的）经济规则、民族规则、结构规则，这些规则使这些系统相关于一种博弈（象棋博弈，索绪尔语言学的主要隐喻）。^①

在索绪尔的影响下，巴尔特在其《符号学原理》中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完成了他关于符号学的构想。这一构想曾经被索绪尔提及。^② 符号学，按巴尔特的定义是“有关一切记号系统的科学（虽然有待建立）”，“符号学是对语言学知识的模仿”。^③ 在这本符号学奠基之作里，巴尔特把符号做了四对二元区分：语言

① Barthes, R. *The Semiotic Challenge*,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 Wang, 1988, p.155.

②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到，“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为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来自于希腊语 semeion）”。参见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15.

③ Barthes, R.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p.9.

与言语、所指与能指、系统与组合、直指和涵指。很明显，前面三组是索绪尔对言语活动进行过的区分。而最后一组是巴尔特在分析大众文化时发现的“神话结构”中总结出的一对概念。它属于次级符号系统。两个系统之间是嵌套关系，在意指过程中，一个平面层构成另一个表达层的能指。而意指系统又可以分为涵指系统和元语言系统。依据语言学理论，巴尔特对符号学进行了结构主义分析。在他看来，符号[如信号(signal)、指号(index)、肖像(icon)、象征或符号(symbol)、譬喻(allegory)等]包含两个关系项，它们的共同成分是“必然归结为两个关系项(relata)之间的一种关系”^①。所以，一切能进行两个关系项区分的系统都可以看作符号。因此，符号大于狭义语言，而又从属于广义语言。接着，巴尔特分析了若干符号系统的结构，包括服装系统、饮食系统、通讯系统、汽车系统等。按照巴尔特的理解，符号系统区别于一般语言系统主要表现为“内质”^②的不同。因此他把区别于一般语言系统的实物符号学记号按其功能称作“功能—记号(functions—signs)”。这种“功能—记号”，“表明了一种我们应加以区别对待的双重运动现象。一开始功能充斥着意义，这种语义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人类对物品的一切运用都转化成此类运用的符号了”^③。因此，不管是大众文化中的言语或话语、文学文本等都是符号化的过程，都可以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来寻找意义。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巴尔特此处所做的铺垫(尽管巴尔特称是无意的)是为文本研究开辟一种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而这是身处20世纪中叶法国思想流变场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运用索绪尔理论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神话结构分析一样，巴尔特接下来就着手为现代叙事文本寻找出一种句法结构。

① Barthes, R.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p.35.

② 此概念来源于叶尔姆斯列夫。

③ Barthes, R.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p.41.

1966年巴尔特发表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①是叙事学的奠基之作。他认为，“叙事本身是与人类历史同步的，因此，叙事作品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一般，是永存的。而在一切的叙述形式中，一定存在着一个共同模式”^②。他把叙事作品分为三个层次，即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按照语言学理论，一个句子可以描述为语音层、音位层、句法层、语境层。句子充满意义是因为各功能的层级组合关系。而语言学最大的研究单位就是句子，倘若分析叙事作品，就必须建构一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事句法来描写作品的生成。和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样，巴尔特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叙事结构描写（即根据故事的组成部分和这些方法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对故事的一种描述）。^③在这组句法中，功能对应意义切分单元，行动层对应人物的结构身份，叙述层对应句子的谓语。通过变异（distortion）、扩展（expansion）和模仿（mimesis），叙述意义得以生成。这就是符号学中的替代测试（commutation test）。符号学家丹尼尔·张得乐（Daniel Chandler）将此定义为“确定区分性能指及其意义决定是否一个能指层的改变会导致所指层的变化”^④。如此，一套建立在叙事文本上的句法就被建构了。它延伸了语言学的单位，在符号学层面，把文本当作一个单位，由若干个语素（morpheme）生成，而每一个语素的改变都会引起意义的改变。就如乔姆斯基句法学的最简方案（一个句子由一个名词词组和一个动词词组所组成，即S=NP+VP）一样，叙事文本也有它基本的定式。《叙事结构分析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巴尔特符号学走向了结构主义的顶端。但很快，他更换了自己的理论。这种更换不是基于外界的批评（尽管外界的批评可能是促使他走向结构主义的理由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他发现，还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来填补他

① 此文最初发表在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后来收入到《符号学历险》一书中。

② 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③ [俄]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拉曼·塞尔登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代》，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357页。

④ Chandler, D. *Semiotics: The Bas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88-89.